第十七章　旅居香港

（1939－1942年）

香港与我的一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特别在我的晚年，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的母亲结婚前曾在香港岛（1842年道光皇帝割让给英国）度过一年时间，以便补习英语，我自己第一次到香港岛是在1895年，那年我取道伦敦赴美留学，途中在香港登岸游览。大概在1903年，我任教上海时，曾专程到香港看望好友唐国安，他是为避义和团而从华北退居香港的。我们二人与从澳洲墨尔本来的钟牧师（一位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英国学者）一起到澳门和香山（现为中山）附近的村庄观光。香山是孙中山、唐绍仪等多位名人的故乡。后来，1934年和1936年我两次从莫斯科回国途经香港时，都上岸逗留了几个小时，那时，香港的发展与繁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香港是中国南方的航运中心、商业巨埠，地位十分重要，但那时，除了广东人之外，我国内地人，即便是上海人，也很少了解或关心香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其总行就设在香港，国内也有不少商务公司在香港登记注册，这些情况，一般人都不知道。广九铁路筑成后，广州与香港就更接近了，两地之间还有定期班船往来，省港交通极为方便。每当广东省境内发生动乱，富人与政客，都要避居香港。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20年代在上海公共租界发生的五卅惨案[1]和广州沙基发生的英人枪杀中国人的惨案，导致爆发省港大罢工。自此以后，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排英的势头愈演愈烈，香港的商务也极受影响。后英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以修筑粤汉铁路南段，并经双方同意，最终将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相连接。于是，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一个广州及其广大内地货物出口的门户，重新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1937年8月13日，中日又在上海爆发了战争，很多人避居香港。百年前，清朝皇帝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时，怎会料到日后香港竟成为国人的避难之地。其时，涌入香港的人，有政治家及其追随者、工商业者、银行经理、教员、记者、作家等等，他们来到香港后，在更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事业。香港的人口在那时极度膨胀，从不到100万增加到150万。人口的剧增，也为香港带来了财富和进一步的繁荣。为解决住房问题，大量的新房建起来了，特别在九龙，房地产买卖兴隆，公用事业发展迅速。生活费用也随之上涨，一港元原来兑换法币仅为8角，而后来竟可兑换4－6元。

香港虽然与祖国内地近在咫尺，但经英国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香港华人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已很少感兴趣，对国内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和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更少理解。他们仍然维持原有的社会生活习惯和教育方法，不思变革，他们眼睛所盯的、脑子所想的，也许更多的是伦敦而不是北京或南京。甚至在有些

---

[1] 原文为"the May 5th Incident at Shanghai…"（上海5月5日事件），似应指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厂"打死工人顾正红一事"，此事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译者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人看来，他们的“老家”当是英国而不是中国，他们的目的和理想应是做个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香港店铺和街道的中文名称以及一些日常用语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里常常把原有的英文名称直接音译，用字又不加考虑，令人费解。例如，“商店”称“士多”，来自英文“store”；而“衬衫”称“恤衫”，将英文“shirt”的音和意结合起来；“保险”称“燕梳”，只取英文“insurance”前两个音节的发音。还有其他种种奇奇怪怪的说法，如，“冰”称之为“雪”，香港气候温暖，当地人原来没见过冰，直到有了人造冰，才知道水会冻成冰。还有，一条不长的街，英文名称为“Public Square Street”，直译应为“广场街”，港人却称之为“四方街”，误将英文“square”也当成了形容词。而一条确实很短的街，英文名称为“Short Street”，却译成“夏街”。最令人捧腹的是，“Waterloo Road”被译成：“窝打老道”，听起来就成了“我打老道”。

在国内，很多用语和名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替都发生了变化，但香港却照样在使用。“警察局”叫“差馆”，“军官”叫“兵头”，这还是清朝时对香港殖民政府里的警察局和军官的叫法。至于“皇家”、“皇后”、“太子”、“公爵”等等名称，沿街常常见到，中文音译听起来实在滑稽可笑。应该承认，自从民国建立三十多年来，国内语言词汇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经常了，而香港却又过于死守旧名称、老叫法。学校或学院，香港仍叫“书院”，而在国内却先后有“学”、“学堂”、“学校”、“中学”或“中学校”、“学院”的叫法变化。

抗战以来，内地很多人来到香港，他们办起了报社、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港人由此才了解到一个新的中国、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观念，虽然，当时港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还未达到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t.com

像海外华侨那种高度，但变化毕竟明显地发生了，特别是国语的传播，白话文的推广，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一代。

但从另一方面看，由内地避乱来港的人们，确也带来不少丑陋习性，出现了“夜总会”、“歌舞厅”、“陪舞女郎”、“导游”小姐等等，他们花天酒地地应酬作乐，通宵达旦、昼夜颠倒。香港人原本虽富却节俭，从不乱花钱，而内地来的人滥给出租车司机、餐馆女招待、门童和女仆小费，这样一来，使住旅馆、下馆子的费用也大大提高了。一句话，有些新来港的内地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香港人也开始以他们为榜样。广州失陷后，那些最有名的餐馆老板都逃奔香港，新开张的酒楼饭庄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店名招牌都取自北京的宫殿名苑，里面装潢也与之极匹配，各色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那时，香港作为中立区，不仅成为战火边缘的乐园，也成为从事战地慈善工作的各种机构的活动基地。首先，中国红十字会总部从上海迁到香港，大量海外华侨和国际上的捐款也转移到香港。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了食品和药物。香港妇女全力以赴开展抗战赈灾工作，不断举行义卖、舞会等，以募集资金。一些教堂在内地设立孤儿院和医院，照看战争孤儿和部队伤兵。香港民众积极自愿地投入到支援抗战的事业中，同时还要为香港当地的大量慈善工作捐献钱物。

香港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非常适合作为某些国际性团体的开会地点，如负责中美、中英文化基金的董事会、内地一些教会大学董事会等等，其成员分散在国内沦陷区和自由区，董事会的会议则均在香港召开。香港是中立区，言论、出版都比较自由，因此，港岛成为出版社的首选之地，而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很多工厂也搬迁来港。在新界，有不少海外华侨建的住宅，他们本想落叶归根，回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r.com

到故里，但是家乡的秩序和安全情况不很好，于是就选择了新界。香港通讯发达，航空邮递方便，因此，又成为国内沦陷区与自由区之间，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络的中心。由于地理位置和特有的政治联系，香港能最迅速地获得有关中国和世界的信息，而远东其他地区都难以与之相比。

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不少人通过经营房地产、进出口贸易等发家致富，成为豪门大族。世界各地的华商也在香港设立分公司。为数可观的一批富商生活在香港，安分守纪，从不显山露水。一些从南洋回港的富翁，修建了豪华的住宅和乡间别墅，并且还置有大小快艇、游船。某家高级俱乐部只有7个会员，俱乐部有公共休息室，而会员每人还都有属于其个人的休息室，非会员也可以借用他们的休息室，招待贵宾。香港的富家子弟一般就读于剑桥或牛津，不少人攻读法律，成为律师或法官；还有不少人学医，成为内科医生或牙医，他们医术高明，很多患者慕名前往就诊。近年以来，香港大学也培养出不少专门人才。

香港人非常好客，但他们常在家中招待客人，而不像国内那样喜欢在酒楼饭庄招待。因此，我有幸到香港很多知名人士的家中作客，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很多夜晚与他们在文化沙龙聊天，或打桥牌、玩麻将。他们中多数人游历过国外许多地方，或在国外受过教育，对于世界情况了如指掌，远胜于国内与他们地位相当而从未出过国门的人。他们虽然忙于自己的专业工作或忙于经商，但也挤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在各种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里任职，特别是充当立法局的议员。通过这些知名人士的沟通，普通港人得以与英方人士建立或官方或私人的联系，加深彼此了解，互增感情。在英国攻读法律后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因受过良好的训练，

均擅长雄辩。而港人中也有很多人能用流利的英语公开演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受英国社会风气的影响，户外活动在香港也很盛行，虽然足球、网球、高尔夫球的爱好者较少些，但棒球（由一位毕业于日本大学的梁老先生提倡、教练，而得以推广）、垒球，以及游泳、徒步旅行、驾车等等都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参与，积极性之高远甚于国内，即便是上海也比不上。跑马是最花钱的运动，当然只有富裕人家才能有此嗜好。

与上海人相比，香港华人在很多方面保守得多，不过，近年来已发生了不少变化，社会风气更为现代化了。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仍很严肃，讲究守成，崇尚节俭，与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很相似。

1940年的秋天，香港酷热难忍，不少朋友要去马尼拉换换环境，当然这也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战火可能波及香港。我与朋友们同行，这是我第三次游览美丽的菲律宾。马尼拉的气温，白天高于香港，而夜晚却比香港低，感觉凉爽，因为该城紧临大洋。马尼拉的居住区相当美观，近郊也有多处迷人的景点，很适合野餐，乘车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高尔夫球场及俱乐部尤为整洁幽雅。新开发的塔格台区坐落在一座山上，那里有家漂亮的“乡村旅馆”，凭窗眺望，可以看见不远处的火山湖，这家乡村旅馆真是游人喝下午茶或度周末的好地方。在马尼拉市区和乡村有一些古老的教堂，不禁令人想起在西班牙所见过的教堂，菲律宾群岛上还保存着很多西班牙统治时期留下的文化遗迹，特别是宗教方面的。这里乡间阡陌交错，稻浪滚滚，犹如我国江浙一带的田园风光，而椰子树、芒果树则遍地成林。田间河边的水牛与在上海郊区见到的一模一样。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in.com

马尼拉的住宅也像香港似的，都装有防盗门窗。街道两旁，树木成行，花红草绿，而香港、九龙，街道虽整洁，绿化却不如马尼拉。马尼拉还在公共建筑方面花费大量资金，不知他们是如何运作，如何维持开销的，因为其民众相对来说比较贫困。这里还有一件使人惊讶的事，马路上到处是出租车和私家车，颇有美国风格，虽然出租车车费是世界上最低廉的，可也不知普通百姓怎么乘得起出租车或开得起私家车。居住在马尼拉的美国人，生活极为舒适，或住漂亮的小洋房，或住公寓大楼的单元房，有许多俱乐部、电影院、避暑山庄，还举办军事夏令营等等，应有尽有。这在其他地方或属平常，而在远东，却不多见。

马尼拉也有一个华人区，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区，有他们自己的俱乐部、行会、旅馆、学校等。该区的华人大部分来自福建，小部分来自广东，生活看来比我所见过的其他地区的华侨要富裕。像通常在国外一样，我又多次应邀作演讲，有时用英语，有时用国语，有一个朋友为我翻译，译成福州或厦门方言，广东籍华侨似乎也能听懂这种方言。

这种奇特的语言现象，使我想起40多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教会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一位福州籍的牧师，应邀向上海会众演讲，他用的是福州方言，由一位懂福州方言的美国牧师把他的话译成英语，然后再由另一位在上海传教的美国牧师把英语翻译成上海话。也就是说，一个福州籍的牧师与一个上海教友交谈，需要两个美国人居间转译。造成这种可笑的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当时还没有推广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一次马尼拉之行，我发现年轻的一代不仅懂得，而且会讲国语，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华人俱乐部欣赏学生演出的剧目，学生完全用国语对话，很令人高兴。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in.com

华侨看来很擅长经营旅馆和餐馆，无论规模大小，生意都很兴隆。当地劳工阶级通常都在华人开的“潘茨塔里亚斯”(pancitarias)摊点吃午饭，“潘茨塔里亚斯”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来的，大概来自英文“cafeteria”(自助餐馆)。经询问，“panci”是福建方言转译过来的，意思是家常便饭或小吃。马尼拉市内有华侨经营的几家大饭店，为菲律宾人承办酒席，在通向碧瑶的大路旁，也有这样的饭店，不过服务对象是美国军人。华侨在马尼拉开办有两家大银行，其中一家是国内交通银行的分行，还开办有很多的五金店、食品店、小吃店、印刷所、大药房，以及无数小铺子。据说菲律宾的很多政治领袖都有华人血统，而且长相也像华人。而华侨也随乡入俗，常常取西班牙人或菲律宾人的名字，所以，有时候令人吃惊地发现，从名字来看是个外国人，其实却是华人，而且早就认识。由于华侨有智慧、有事业心、性格坚强、勤奋、友善、节俭、忍耐，因此，他们在马尼拉的商界和经济生活中获得了令人称羡的地位。

我也很高兴地见到了不少在马尼拉居住的美国人，有些以前在中国住过。那里的扶轮社邀请我作演讲，菲律宾大学也邀请我，1000多名热情极高的教师和学生听了我的演讲。美国统治菲律宾群岛40年，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菲律宾各个方面的领导人物都很美国化，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在美国接受的大学教育。菲律宾的教育制度完全仿照美国，有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充当顾问，提供帮助，他为此付出了40年的心血。菲律宾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包括运动、消遣、交通、运输、社交、经济，无不以美国为蓝本。一位在当地居住的美国人对我说，美国对菲律宾的贡献有三项：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卫生、公路。

但经过大致考察之后，有人认为菲律宾各方面的标准，无论是

私人生活，还是公共行政，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财力，一旦美国人撤出的话，他们将很难维持这样高的标准。不像欧洲强国统治的殖民地，美国政府并不剥削榨取菲律宾本地人民，而是给他们以关心和教育，可以说，“给与”多于“索取”。一旦美国撤离，菲律宾将很难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民众也很难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因为没有了美国人在那里大把花钱，当地经济自然要蒙受损失。

在碧瑶小住三天，备感身心愉快。碧瑶是一座迷人的山城，为我一生游历中所不多见。它坐落在一处高原上，那里有美丽的公园、高高耸立的天主教堂、餐饮旅馆、避暑官邸、军事夏令营、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以及无数的别墅，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极为方便。碧瑶现已成为菲律宾政府的夏都。旅游者去碧瑶，可以乘坐火车、汽车，也可以乘飞机。在碧瑶居住的华侨有2000人左右，我们参观了那里的一所小学，大概有60个学生。当地有三家大饭店，其中两个是华人开办的。当地华侨还开了很多零售商店，也有人经营菜园。

在碧瑶，我们第一次见到有名的斗鸡，斗鸡场只是一个大而简陋的场地，为观众准备有看台。每场斗鸡时间不长，但血腥惨烈，因为在鸡距（鸡腿后面象鸡趾的部分）上绑有锋利的刀片，一开斗，刀片就能杀伤敌手。没几分钟，一方就身负重伤，胜负立决。斗鸡看起来似乎不如斗牛残忍，但都是拿动物生命下注，互搏输赢，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由此不禁回忆起孩童时代，我们到处寻觅，捕捉蟋蟀，希望得到一只最能打斗的，战胜所有小伙伴手中的蟋蟀。通常蟋蟀锦标赛在茶馆里进行，胜者被冠以“将军”、“元帅”之称。

现在回过头来再来谈我们在香港的经验，一般认为，欧洲人的殖民政策极为恶劣，臭名昭著，尤其是法国人在越南、荷兰人在印

尼的斑斑劣迹，相比之下，英国人统治香港，对待当地华人，还算不上专断或不公。但从根本上来说，英国霸占殖民地就是为了榨取殖民地居民，在殖民地掠夺原料，供给他们本国的制造商，又将他们本国的制造品倾销到殖民地，以增加大英帝国的税收，从而令其统治阶级的薪俸报酬更加丰厚。最可诅咒的，还有殖民政府通过垄断毒品贸易获取巨额利润。在香港的居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没有参政权，所谓立法机构，只有少数华人列席，仅供咨询，而且他们并非民选的，而是政府指定的，虽然他们有时也为华人大声疾呼，但起不到什么作用。总的来说，港英政府虽能维持社会治安，捐税也不算苛重，民事诉讼则公开审理，双方可以延聘律师，一般都是英籍律师，但是，遇到刑事案件，如原告是英国人，被告是华人，则往往处理不公，华人无律师为其辩护，警察局只凭一面之词，就对华人处以罚款或判坐牢。且罚款被他们视为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素以官吏不贪污自诩。但久居香港的人都很清楚，这种自我夸耀完全不可信。尤其近些年来，不断传出贪污丑闻，因此当局成立了专门调查团进行调查。只要读一读报上公布的调查报告，就能大致了解贪污和违规操作的严重程度。几个朋友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验放行李的海关关员、巡查码头的印度裔警察、检查卫生的有关人员，以及掌握各种执照、许可证的发放权的官吏们等等，总之，无论什么部门或什么官员，无不公开索贿。不想花钱，就别想办成任何事。至于包庇烟馆、赌场和其他不法场所一类的事情，倒还未听说。专门调查团经过调查，果然查实不少惊人的贪污索贿案，使那些最自以为是的人也只好闭口不言了。贪污索贿的腐败之风肯定需经多年整治才能除去。好在英

方当局已经重视，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决心将惩治腐败坚持下去。

伦敦方面接到有关香港腐败问题的报告也极为震惊，派出廉洁公正的官员前往稽查整顿，清除不良分子，调离不胜任者，让年老体弱的退休；同时着手成立一个清查委员会，准备对香港全体公务员进行严格审查。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清查委员会最终并未成立。但是新的警察局长在短期内就做了不少工作，如取缔公开的赌场和烟馆等。不过，鸦片这种毒品一直是殖民政府的垄断买卖，尽管30年前已签订了《海牙禁烟公约》。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印度的某些邦的首府里，英人俱乐部不允许印度人参加。这种种族歧视在香港同样存在，即使曾接受过英王授勋的华人绅士也不例外，不得参加有地位的英人俱乐部。在赛马俱乐部中，虽有华籍成员，但他们对会务并无投票权，可以想像，没有华人参与，赛马怎能维持下去，既无人养马，也无观众和赌徒去观看赛马。殖民主义者的势利和病态的优越感如此盛行，以至于华人中即使出身、所受教育、文化程度、个人品质、家庭财产都优于英人者，竟然也不能得到同等待遇。

在殖民政府中，高级职位自然都由英人占据，他们不仅在职时领取高薪，而且退休后还能享受优厚的养老金。而政府部门中的华人不管他们工作年头多长，多么忠于职守，相比较而言，薪俸要少得多。在大学中，无论是学术职称，还是薪俸待遇方面，同样存在不平等现象。友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香港大学准备聘任一位医学教授，他们请爱丁堡大学推荐，爱丁堡大学推荐了一位杰出的华籍学者，香港大学感到惊讶，并竟然反对，说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位英人。爱丁堡大学对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要求断然回绝，说："我们认为合格的，想必对你们来说也够合格了吧！"最后，这个推

荐还是被接受了。

在香港，中英两民族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交往，但不如上海和北京。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国际俱乐部，每周聚会一次，但是，在这样一个国际性组织里，看不出双方有什么应有的那种交情和友谊。也许英国人生性冷漠古板，难于与之交往，但无疑在殖民地，英国人才会越发显出无比的优越感和十足的傲气，因此，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绝非出于本性，不过做做样子罢了。

香港有一个山顶高档住宅区，是留给"白人"居住的，只有两户华人被允许入住这块"神圣的地方"。规模很大的外国人开的宾馆不接待中国游客，一些"私人"开办的宾馆公然布告不欢迎中国人。但是，欧战爆发后，西方游客锐减，空房率很高，宾馆经营者突然热烈欢迎起中国客人来，特别是那些从上海逃难来港的，他们花钱极随意，给小费远比西方人大方，因此更受宾馆欢迎。这样，受形势所迫和赢利的驱使，由殖民主义者筑起的歧视本地民族的高墙，又由殖民主义者自己慢慢地拆除了。

国内那些不满重庆国民政府的人到了香港后，发现香港言论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起初，这些人大多数是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们中那些从东北来的人，非常崇敬张学良，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并归还其军权。

后来，在野各小党派在香港组成联盟（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办了一份报纸作为他们的喉舌，发表了他们的纲领，主要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承认各派政党，制定宪法，按照宪法建立政府。

这一联盟虽然并未质疑国民党的领导权，也没有要求国民党放弃政权，但是确实要求立即结束"训政"。他们认为实施他们的

纲领,将使中国更团结,政府将更有效力,抗战将更得民心,并将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一联盟还指出,英美两国已有先例,欧战爆发后,两国政府中都吸纳了国会中的反对党成员。

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香港各抒己见,掀起了一场笔墨之争,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双方偃旗息鼓,一切归于平静。

港英当局的新闻检查引起中文报刊的极大不满,令人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是,在英文报刊上已经登载的新闻和对时局的看法,常常被禁止登载在中文报刊上,中文报刊记者无论在哪里都受到极为蛮横粗鲁的对待。因此,即便是对英国素有好感的编辑也心生不满,这对于两个民族的进一步相互了解非常不利。造成这种局面,可能一方面是检查人员本身对于政治形势缺乏认识,以及对中文的理解能力还欠缺,另一方面,则是中文编辑的立场态度也有可批评之处。

日本占领香港后的日子里,中文报纸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指责英人在香港的种种不是之处。

港英政府最愚蠢无礼的做法是,始终拒绝重庆国民政府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而在香港遭遇日军进攻的危急时刻,却又天真地请求中国方面给予军事援助。以中国在香港的贸易额之巨,寄居香港的华人人数之众,以及中国在所有的大国设领已有多年的事实,更何况伦敦方面也早就正式同意中国在香港设领,而港英当局却一意孤行,以拖延来达到拒绝的目的,真是匪夷所思。近些年来从上海来港的人们,谈起这件事,尤感愤慨。由于殖民地当局的不明智行为,而使英国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竟不能获得中国人的同情,这岂不令人惊讶?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n.com

随着战事的进展，香港住民的神经越发紧张。首先是英国妇女和儿童（只限白人）撤往澳大利亚，接下来是日本妇女和儿童的撤出，他们不像英人那样仓皇狼狈。一些华人也跟着撤离，富有者想去马尼拉或上海住一段时期，也有人想去更远的檀香山，甚至美国本土。从上海又传来消息说，有些人家决意举家迁移巴西。为逃难保命，这些人竟如此不顾一切。但是，绝大多数留在香港的国人并不认为时局严重到如此地步，至少不认为战火快要烧到香港，不必自我紧张。等到德国对苏联实行闪电战，日军侵入越南，以及向满洲—西伯利亚边境大举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才认识到时局是多么严重。

报纸上通篇都是关于日本下一步行动的分析猜测，是西进、南进，还是北进？或西、南并进，还是三路同时推进？一般认为，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了结中国事件，对其他问题只是想通过显示一下武力，而非实际的军事行动来加以解决。至于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会在近期发生，因为两国都不想开战，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于政府对德宣战都强烈反对，更不用说对日宣战了。

然而，日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趋严重，美国通过禁运和最终冻结资产对日本施加强大的经济压力，这样不仅阻止了日本获得更多的原油和其他原材料，而且实际上断绝了美日贸易。美国政府要求在远东地区的美国人撤回美国，并从中国撤回其海军和陆军，组建了两洋海军，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计划在关岛建立军事要塞，以上举措，无不使日本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1941 年 10 月，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由陆海军成员组成的新内阁接替。对此新内阁将如何动作有过一番讨论，舆论是悲观的，因为新内阁无论是在制定政策还是在对待以前的承诺方面，完全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b.com

可以自由行动，无人能约束。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松冈的辞职，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松冈辞职后，军人直接控制了政府，并必将推进侵略政策的实施。稍后，来栖三郎奉命赴美，为日美两国即使是暂时的谅解作最后努力，这一行动，使在香港的人们又一次感到了希望，认为太平洋和平局势将可以维持到1942年春季，那时欧洲形势将更加明朗化。产生这样一种乐观的观点，部分原因是自以为是，自我陶醉，部分原因是低估了日本的力量和它在远东建立新秩序的野心。一份中文期刊上刊登了两篇据说是日本问题专家写的文章，一篇认为日本将与民主国家及其联盟协约国为敌，另一篇则持反对意见。前一篇最可观之处是预言日本将在12月上旬行动，部分原因是那时西伯利亚前线的河流将会结冰，日本军队很方便就可以渡河。

11月里，有消息传来，日美达成暂时谅解，太平洋和平大概还可以维持3－4个月，不少香港人的心头不禁感到阵阵喜悦。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暂时谅解并没达成，美国方面采取了意想不到的强硬态度。形势越发紧张，香港不少人逃往上海或澳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了。

1941年12月8日，当天一早，我正在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餐厅用早餐，大约8点钟，突然听到一连串的强烈的爆炸声，有些人跑到窗子跟前看，当然什么也没看见。餐厅招待说，那是英军大炮演习，当天的《南华早报》刊登的消息也说是大炮演习。但是看得出来，人们还是很紧张，不一会儿，住在窝打老道和太子道的朋友都来电话说，情况不太正常，离他们那里比较近的机场遭轰炸了。稍后，街上满是要去港岛上班的人们，可是他们到了码头，才知道不经特殊允许不准上渡轮（事前根本没有通告），看到这些情况，我

肯定战争确实爆发了。后来得知宣战是在这一天拂晓，消息传来，早报已来不及刊登了。

到处是一片紧张和慌乱，人们无法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一些人在酒店里打电话给香港的重要官员，要求设法让他们上渡轮去港岛。在这些人中，甚至有殖民机关的高级官员，他们也被滞留在那里无法去办公室，事情的发展竟如此出乎意料，而他们只能诅咒眼前发生的一切，别无他法。这时候，情况越来越清楚了，机场的确被炸，不少商用飞机被炸毁。

没过多久，传来了空袭警报，人们再也不怀疑战争已经来到香港。这一天，空袭警报多次响起。半岛酒店的一个很大的地下室立即改成了舒适的防空洞，里面有折叠椅、行军床、还有电灯，甚至电风扇，酒店客人和前来躲避空袭的人都可使用。

很多人没有料到战争会那么快爆发，根本没有准备，手头没有现钱，也没有贮备食品。战争的消息传来，一般商店都紧闭店门，以防被抢劫，一两家仍在营业的小店，则乘机高抬物价。我在街头叫到一辆出租车去一位亲戚家，亲戚需要一些小面额的钞票，但是很难兑换到，甚至酒店里附设的银行也限换一张100元钞票的零钱。各方面都被搞得措手不及，造成种种不便，使人们越发感到恐慌。不久，一直忙个不停的电话突然不好使了，灯火也受到严格管制，我们只好在黑暗中摸索，不禁又增添了几分疑惑和紧张。酒店很明智，立即开始限量供应饭菜，每餐只有一汤、一菜、一份甜点。但很快，午餐不再供应甜点，早餐没有了鸡蛋。听到轰炸声的那天晚上，酒店里的一些客人从收音机广播里听到日本轰炸了珍珠港、马尼拉、新加坡，美国军队在珍珠港伤亡惨重，“俄克拉何马”号战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舰中弹沉没。

当时,对于日本究竟是在宣战前,还是在宣战后发动进攻存有争议,一般人并不知道日本和美国之间有时差,相差好几个小时,所以,日本完全可以玩弄花招,声明它是在宣战之后才发起进攻的。经过星期日夜晚的尽情放松娱乐,星期一清晨人们还在睡梦之中,日本正是选择了这个时候发动偷袭,使对方难以应对。

新界的第一道防线据说设在界限街,第二道防线则设在沙田附近,那里既有群山作屏障,又在山头筑有碉堡,工事坚固,可以坚持多日,等待援兵到来。大概在11月中旬,一支加拿大分遣队抵达香港,又传说将从新加坡调来一支海军,其中有先前抵达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但不久,报上登出那两艘战舰被日军炸沉的消息,真是太令人沮丧了。另有消息说,殖民政府已向重庆方面紧急求援,不久将有一支30000人的纵队袭击日军后方。但是,所盼望的纵队并未出现。先前广州陷落时,英方曾将我国退往九龙边界的士兵解除武装并扣留,关于是否应释放他们,英文报纸上曾有过一番争议,直至此时香港危急,殖民政府才终于释放了他们,令他们充当救护部队的担架兵。

开战的第二天,在九龙的外国人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渡海赴港岛的通行证办理处,于是,门前排起了长龙,申请者太多,使普通人仍然只好望洋兴叹。日本飞机不断掠过九龙上空,上午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酒店地下室度过。很快大家明白日本的空袭目标是在香港岛那边,因为日机没有在九龙这边扔下炸弹。下午是阴天,我冒险外出走动,也想去看看住在山林道上的朋友。此时外出的人很少,停在弥敦道终点站的公共汽车,也不再按时发车。昔日繁忙的大道两旁的店铺大都紧闭店门,并封上了结实的栅栏。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r.com

电话时通时断，我接到何东先生家里来的电话，说何东先生正在澳门，前些天何东夫妇举行钻石婚庆仪式时，澳门总督亲自前来祝贺，因此他特往澳门答谢。他们家的大住宅已被军方征用，全家已搬到"山顶"一处较小的住宅。当晚，听到重要新闻广播，美英对日宣战。

星期三，是一个阴天，有阵雨，我冒险去了香港岛，与一些朋友见了面并一起吃午饭。看来，当时一般人还都不了解当地局势有多严重，因为早报坚称港九防守能力绰绰有余，足以应敌，尽管前一天夜晚在酒店里，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使人难于入眠。这天下午，接到朋友从马尼拉来的电报，说他从斯堪的纳维亚一路游览过来，现正在开往上海的船上，船一抵香港，即上岸拜访。下午，空中云层很厚，天气阴沉、潮湿，日机未出现，没有空袭警报，我乘此机会去圣心酒店看望友人。

我曾答应过照顾住在山林道上的一个朋友的眷属，因为空袭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我决定于星期四上午将这家女主人和三个孩子转移至我住的酒店，以便就近照顾。星期四上午运气不错，叫到了一辆出租车，答应司机多给他小费，终于安全地将母子四人转移到了酒店，午前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地下室里，紧张害怕的情绪放松了很多。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出乎我们的意料，情况变得糟糕起来，原驻酒店的一些华人警察，经过一番交头接耳之后，没有打声招呼就突然都撤离了。据说，有的人走时还将他们戴的钢盔扔在地上。华警的撤走，立即在拥挤的地下室里引起一片恐慌，没有人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撤走。进而传说英籍经理正在劝告"外国客人"渡海去香港岛。我们中有两人去向经理探问究竟，经理紧张得像只没头

苍蝇，在大厅里团团转，最后声称都是不负责任的人造谣生事，没有什么可恐慌的。我碰巧遇到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代表，他也注意到了酒店经理的紧张表情，我请他去问一问经理。他得到了完全相反的消息，他回来告诉我，他已接受去香港岛的劝告。我将这个消息迅速转告我的朋友，要他们尽快决定去留，因为前线的形势看来也不妙，日军可能很快会到九龙。有人建议大家都走，从这个酒店的规模和所在地点来看，肯定会被征用。

其实，原先这座酒店是打算改作军用医院的，前两天里，整个一层和一半大厅都已划作伤兵病房，并布置就绪。第三天，所有的床铺又搬到了界限街的“拉萨尔”书院，看来酒店并不适合做伤兵病房。

这样，我费尽周折将朋友的眷属转来酒店，又不得不将他们送回家中。开始没有交通工具，只好步行，后来，找到一辆人力车，车夫哪里也不想去，费了一番口舌，才勉强答应。在酒店门前，我遇到了早就认识的犹太富商，他和他的看护刚从上海来，要去香港岛，这样更加印证了酒店英籍经理所谓的中国客人留在酒店是安全的一番话，是完全不可信的。

整个夜晚，我们听到弥敦道上军车经过的隆隆声，这是败退的英军在逃往香港岛，日本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还听到不远处响起清脆的枪声。早晨，听说在弥敦道和附近地区的其他道路上乱轰轰的，因为九龙警察都已撤往香港岛，强盗团伙乘机抢劫了那些地方的商店和私人住宅。

当时九龙行政当局也已逃跑，成千上万的九龙华人居民就这样被丢在那里，如同孤儿一般，不知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

我的朋友一家住的四层公寓楼有8套单元房，每层两套，房东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ib.com

住在一层。这位房东是个富商，平时交游很广，与一般黑社会也有来往，黑社会的人答应"保护"这幢公寓楼不遭强盗抢劫。于是，每家同意付100港元作为"保护费"，说好先付20元，等日军占领，秩序稳定后再付另80元。这天晚上有4人看门，我们都放心入睡，睡得香极了。当时，大家都承认，付了"保护费"，强盗真的不来光顾了。这正应了庄子的一句至理名言："盗亦有道"。[1]

当天傍晚，日军果然进入九龙，入夜，到处一片死一样的寂静，星期五一早，竟然见到街上挂满了太阳旗表示对日军的欢迎，人们立即回到家里，紧闭家门。刚过中午，听到了激烈的炮声，随后就归于沉静。难道一切都结束了吗？还是双方都太疲劳了需要休整？我们的住房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浸礼会教堂，通过我朋友的安排，上述母子4人躲进教堂里，那里已经有很多妇女儿童。考虑到要照顾好几个孩子，还要送饭到教堂去，很是不便，于是第二天我又把他们接了回来。日军占领之后，日军卫兵就在我们门前的街上巡逻，因为这里通向弥敦道上的日军军营，不过，我们被允许自由出入家门。

中国红十字会就设在附近的一条街上，我去那里拜访主管人，当时会长和几个副会长都不在香港，主管人也已有好几天没来办公室了，工作人员对于眼下的局势很感忧虑。前一天晚上，有盗贼闯入红十字会，当告诉了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后，他们才没有动手，可是，后来他们把红十字会的房间当作仓库，用卡车把抢夺的物品运来储藏在那里。另一伙人又砸开坐落在高处的这个院落的铁门，想闯进屋来，结果其他房间里的仆人扔下花盆，打

[1] 原文误为老子(Laotse)所说，应为庄子，见《庄子·胠箧》。——译者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r.com

中了几个人的脑袋。附近的一个旅馆也用这样的办法打退了前来抢劫的歹徒。星期五晚上，九龙这边有激烈的枪声。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中国红十字会，并给主管人留了字条，建议在目前的危急情况下，既然有关当局已不复存在，无人出面为受难民众说话，红十字会应挺身而出。刚好红十字会会长住在红十字会办公室的楼上，因为他自己的房子被英军征用了。他看到了我留的字条，很赞成我的提议，并邀我去商讨这件事。当我应邀去他那里时，正巧几个日本宪兵也在他那里，主人把我介绍给他们，我们将两会的工作性质向他们作了说明，他们表示赞同，并且表现得彬彬有礼。

在我们住房的三层楼上，住着几个我们认识的老太太，每当空袭警报响起，为安全起见，她们就下楼到一层我们的住房来。她们都是小脚，白天下楼还比较容易，晚上着急下楼就太要命了，所以我就安排她们睡在我们客厅走廊的地板上。那天晚上还算平静，可是自来水却停了，好在浴缸里储备了一缸干净水，足够用两天的。第二天一早，街上满是拿着盆找水的人。这时候，只有靠井水了（九龙地方每幢房都有机井，用井水冲马桶），因为停电好几天了，不能用机器，只好人工打水。不过，有的井水不适合饮用，而有的井水看起来还算干净，能饮用。

到这个时候，供应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只好忍耐，首先，主要街道的交通已停顿，第二，商店都关门，很远的地方虽有集市，但东西也少得可怜，一会儿就卖完了。我们的仆人虽然胆子挺大，每天出去两次买东西，但常常空手回来，或只买回一些西红柿和萝卜之类的。我们住房的对面是“天文台山”，有些人冒险到那里，发现了一个菜园，高兴极了，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菜都连挖带拔地全弄走

了。街上传说九龙铁路仓库开仓救济，于是，有几百人拿着各种各样的装粮家什，从我们房前经过前往仓库。我们为节省用粮，改喝稀粥，饮用水也省着用，很饿的时候，用几块饼干抹点儿奶酪充饥。在我们的住房后面是皇家公园，里面有个俱乐部，日军很快占领了那里，原来挂的米字旗换成了太阳旗。占领军显得很有纪律，沿街站岗的卫兵态度也尚好，当有人特别是妇女要去集市或去弄水，都允许通过，没有发生什么扰民之事。两个不带武器的士兵进过我们的住房，抽了支烟，喝了点茶，就走了。后来他们注意到屋子旁空地上停着一辆汽车，又来要车钥匙。我们用手势比画着答复他们，他们弄不懂我们的意思，也就离去了。

我们的住房有点太拥挤，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我决定搬出去。通过红十字会的帮助，在马路对面的丽嘉酒店找了一间房。那里每天也只供应两顿极简单的饭菜，而且最要命的也是没有自来水，不过，因有不少朋友住在那里，不觉得日子太单调，每天我还可以花上一两个小时呆在红十字会办公室里。有几个宪兵驻在酒店以维持秩序和保证安全。

避居在丽嘉酒店的那几天里，我仍经常可以听到落在香港岛的重磅炮弹所发出的阵阵可怕的爆炸声，英军发炮还击，炮弹好像在我们附近的地方爆炸，门窗震得直晃动。空袭经常发生，不过，大家知道不是轰炸九龙，因此不太害怕。一天清晨，在奥斯汀道上遇到一位朋友，带着一群男女，背着包裹，匆匆地走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炮台街他的工厂，因为他在汉口街的住房前天晚上被炮弹击中了，他们幸亏在天刚黑时就下到楼梯间，否则肯定被炸死了。不过，据我们所知，双方炮战中，九龙平民很少有人丧生。

12月17日，我们被劝说搬回到半岛酒店去，以便得到更好的

保护，不至于受到抢劫或流弹的伤害，据说更紧张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酒店里满是难民和酒店员工的家属，他们都睡在地板上，还有一些回头客和新来的客人。我们一群人，大概40来人，被指定住在4层楼上。又经介绍，我们见到日军代理参谋长，要求用车，他即派车到丽嘉酒店把我们的东西运来。同时听说，九龙湾景楼旅店已改作英俘收容所。

半岛酒店也几次遭歹徒抢劫，但华籍员工在他们徐经理的带领下，击退了歹徒，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只有几扇窗户被打破。英籍员工早逃跑了，亏得有胆大能干的徐经理，使酒店还算完好，并管理得井然有序。酒店楼上房间的窗户玻璃有机枪子弹的弹孔，但整幢楼还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不过，面向香港岛的房间因易遭枪炮攻击而不再住人。

据住在兰心酒店的客人说，有两个妇女，一个英国人，一个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香港，去接洽交战双方可否议和，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财产损失。但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说在日军进攻部队登上香港岛之前，根本不可能考虑这个建议。所以，战争继续进行，日军很快就发起了总攻。

激烈的炮战持续不断，空袭次数更加频繁，日本海军在浅水湾和香港仔湾开始了行动，九龙这边的发炮声比以前更猛烈，香港岛方面也开炮还击，毫不示弱。炮声轰鸣，犹如滚滚雷声，我们只好一直呆在走廊里，耳朵里塞上棉花。后来，日军又有一支生力军赶到，双方炮战更加厉害。这天晚上，风很大，日军渡海有一定困难，而且，对面海边又没有沙滩，给登陆造成了麻烦。英军方面，依靠海边又高又坚固的堤岸作掩护，布置机枪阵地，防守比较容易。

就在这时，大火从七姊妹道附近烧起来，这场大火持续烧了一

个礼拜，显然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油池起火，白天，浓浓的黑烟直冲云霄，遮住了一片晴空，夜晚，红红的火焰窜至周围高楼大厦的楼顶那么高。从酒店阳台上望去，真是一片恐怖的景象。

日军发起总攻大概是在19日，随之，我们清楚地看到山顶区及其周围地区遭受到猛烈的攻击，日军的轰炸机接连投下巨型的重磅炸弹。空袭警报又呜呜响起（不久，警报器肯定坏了，再也没响过），高射炮发射时的声音和火光我们都能听到和看到，但是打得不太猛也不太准，因为没有看到有飞机被打下来。那天晚上比较平静，听说九龙这边的日军登陆部队成功地在鲤鱼门附近登陆，那里的海面相对比较窄。

接下来的一天，战斗继续进行，可以看到香港岛上多处地方火光闪耀，令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精神上也饱受折磨。而九龙没有经历这样激烈的战争，不过人们过去总是认为香港岛更安全些，因此战争一开始，立即想方设法渡海去香港岛。然而，现在日军攻入了香港岛，一个气球拉着标语升向空中，宣布日军成功登陆，密集的机枪声也许表明登陆部队正在向市中心进发。

星期日，整天相对比较平静，我们这群人中的女士和仆人离开酒店回到各自家中，因为住酒店太贵，尽管因饭菜简单，房费已经大大降低。这天，两位女青年（一位是日籍）带来了一张日文的新闻简报，载有战争消息，是当地印刷的，还带来一张广州的报纸和一些无线电讯，新闻简报上的日文先译成广东话，再译成国语，这样，我们才知道艾登先生正在莫斯科访问，与斯大林交换意见。

第二天，星期一，只见香港岛那边的永安公司附近一带燃起熊熊大火，而九龙这边，渣甸道上的汽油池被发自香港岛山顶区的炮弹击中，烈焰升腾。不久，Laichikok街附近也火光冲天，肯定是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Socony汽油公司的油罐被引着了。我们中一些人借了一辆车，到窝打老道和太子道去看住在那里的朋友，发现他们都挺好，只是那里的很多人家被抢。虽然日本宪兵努力维持秩序，但也没有用，抢劫仍然发生，还越来越多。

大概在12月23日，六国饭店附近的皇家海军船坞和海边建筑遭到猛烈轰击，多处起火，不少船只沉没。有名的百年老木船也着了火，火势并不猛，慢慢地焖烧，数日不熄。空袭的次数比以前增加了，轰炸机不断掠过，扔下重磅炸弹，山的南边窜起一个个大一个火球。下午，停战议和的努力再告失败，大炮攻击的目标集中到了山地，空袭投弹也都瞄准金马伦山顶以东。大炮、轰炸机同时向该地狂轰滥炸，异常可怕。炮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发出的声响就像重磅木球在球槽里滚动的声音。我们猜测着炮弹攻击的目标，然后看到一团烟尘腾起，几秒钟后，爆炸声就传过来了。恰好坐落在山顶区下面的一所房子多次被炮弹击中，可见命中率之高。

圣诞节在炮声中来到战争前线，虽然我们照样有烤火鸡和葡萄干布丁，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胃口，也打不起什么精神来庆贺。因为停电，天黑了不方便，因此每天下午6点钟就开晚饭。我们的神经被迫经受可怕的紧张和雷鸣般炮声的考验。一个俄籍音乐艺人向人讨烟抽，烟在那时即使愿意出天价都很难买到，他诉说道，他的神经要崩溃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小不点儿子的神经也要崩溃了。这不禁使我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恐怖场景，上千门大炮连续三天三夜轰炸阵地，士兵们掩蔽在战壕里，生死由天，炮声一停，他们就得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想到那种场景，眼前的战争不过像是小孩玩打仗而已。

这时候，香港岛方面的防御战已明显难以坚持下去了，后来读

到版面大大减少了的12月24日的《南华早报》，我们推测那里的水源已被切断，军心涣散，加速了香港岛的失守。前面提到，空袭警报已经停止，现在炮战也已接近尾声，高射炮则更少发射，实际上，高射炮从未打下过一架敌机。圣诞节早晨在宁静中度过，但午饭后响起了喧嚣声，山顶区和半山腰的建筑物又一次遭到猛烈炮击，从油麻地窜起的火舌和烟雾升到半空中，形成一条黑云带，足有几英里长，越过码头，直抵玛丽医院上空。想到香港岛白姓经受如此恐怖的战争，简直就是被抛入了地狱中，怎能不令人万分同情？如果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成就，那么还是远离这样的科学吧！

大黑以后，周围难得地安静下来。有人在悄悄传说香港总督已到了酒店，终于同意放下武器。据说，和平之所以推迟到来，是因为英国人愿意看到过圣诞节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第二天早上，和平的消息得到了肯定，这意味着所受的折磨终于结束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开战以来第一次看到摩托艇又从香港岛那边驶来，但仍有机枪声不时打破清晨的宁静，可能还有部分部队不知道围攻已经结束。香港岛笼罩在一片薄薄的烟雾之中，老木船还在慢慢地燃烧。海面上，无数条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船只载着日本兵往香港岛驶去，有些船还是第一次见到。

据报，香港立法院的华籍议员陪同总督作生死之旅，到日军总部投降，当晚，华籍议员返回香港岛，总督大人则被作为“上宾”留在了酒店。元旦后，一份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一封由陈廉伯（“Chan Lim-pak”的音译）签名的信，叙说12月13日，他打电话给立法院的华籍议员，建议政府考虑占香港人口97%的华人所受的战争灾难，尽快接受议和条件。但他被判处破坏“防守法令”罪，被押往赤柱监狱拘禁。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释放，重获自由。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12月27日，秩序重新恢复，至少酒店里的电灯亮了，又有热水供应了，大家都欢呼雀跃，我们真是太离不开现代化的舒适生活了。每个人，大人、孩子都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晚饭也改为7点钟开饭了，当晚，一直到10点钟，人们才回房间休息。晚报上说，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大家都在猜测，这是要他回重庆上任呢，还是要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仍留在华盛顿商洽一切呢？

第二天是星期天，日军预定这一天为香港正式占领庆祝日，据说，庆祝程序包括在山顶区升起太阳旗，以及阅兵等。这天将近中午时分，一个日军高级官员来看我们，他是从南京飞来参加庆典的。这天下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大批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大概有40架飞机组成各种队形，在香港上空盘旋，后来又进行特技飞行，如连续翻筋斗、俯冲、盘旋等，海军航空兵也参加空中表演，在港湾码头，停泊着不少海军舰只，包括一艘小型巡洋舰。

30日上午，只见长长的英军战俘队伍缓缓朝着他们的集中营走去，战俘们背着行囊，大部分是铺盖、衣箱，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已变得太重了，一个个十分狼狈。有的找了根竹竿，两人抬着行囊走，还稍微好走些。有的找了辆破旧的人力车，而装上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简直令那辆破车难以承受，他们慢慢蠕动着。最幸运的人找到一辆结实的手推车装载着行李，轻松地推着走。在战俘队伍中，没见到印度人，而在街上，却有一些穿着便服的印度士兵在自由走动。在半岛酒店后面的九龙饭店已经改成集中营，很多人，大部分是英国人，都被拘留在那里，其中一些人以前住在半岛酒店，我们都认识。一连好几天，日本宪兵用卡车运来很多人，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至于九龙湾景楼酒店则专门作为关押英美籍俘虏的地方。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in.com

下午，我和我们中的其他四人，也带上个人物品，被日军用汽船送往香港酒店。因为我们是与重庆政府有关的“要人”，而重庆已向日本宣战，因此东京下令对我们实行暂时看管。这家有名的酒店当时处在半黑暗之中，因为香港岛上还没有恢复供电。我们5人被安置在同一层楼上，房间很华丽，伙食也很好，远比半岛酒店讲究。但是，没有自来水，做饭烧开水都是用井水，味道上差很多，当然，这里也无法洗澡。第二天早上，据说又有几位同胞被送来饭店，但我们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是被隔离的。

从香港酒店的阳台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皇后大道上的生活景象，虽然大道两旁的商店都没有开门，但是，人行道上满是货摊，大部分是卖食物的，还有卖各种各样的其他货物和小工艺品的。像往常一样，女人和男孩子们在叫卖报纸，这些报纸的版面只有过去的一半。街上人来人往，不过，看来他们大多数属于下层民众，也有少数外国人，可能是中立国的。很少看到士兵，倒是有几个穿制服而不戴头盔的外籍(俄籍?)警察在游逛，最热闹的地方是英皇大戏院门前，那里人头攒动。一眼扫去，除了都城饭店正面有一部分被毁坏之外，整个街道上的漂亮的写字楼和其他建筑都没有受到什么破坏，不过，可以看到写字楼里都住满了人，他们肯定是打仗时跑到那里去避难的。

皇后大道上看起来真像个乡村集市，香港的劳动大众正在这条时髦的大道上，以一种纵情狂欢似的方式庆贺停战，摊贩、货郎、流动餐饮车主、小商人，甚至赌徒们，都利用这一真空时段出来做买卖，干一番营生，而不必顾虑有警察来干预，也不必顾虑违反什么条例、规定，不需要出示什么证件、交付什么佣金等等。他们占满了街道两旁的人行道，叫着、喊着，也有摇着铃铛的，发泄着长久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t.com

以来被压抑的情绪。摆桌赌博虽然很快被禁止了，但是，在有些房子里，“掷骰子”、“摇宝”、“牌九”等赌博照常进行，有人在门口摇着铃铛望风。

香港酒店对面的赌局门前经常举行一种仪式，其场景在当地华人看来也许太自然和正常了，但对偶然见到的人来说还是令其感到惊讶。这天赌局刚结束生意，就看到3个赌局雇员在门口设置一个祭台，放上3碗菜肴，3杯酒，这些菜和酒恭放在赌局门口旁边的人行道上，然后，点上香。这时过来一个人，是赌局老板或经理，恭敬地摘下毡帽，冲着祭台3鞠躬，同时焚烧纸钱。做完这些，祭奠就结束了。这是在祭财神，肯定是赌局在生意中运气不佳。不过，不久之后，所有的赌局就被日军勒令关门了。这就是沦陷后一段时间内香港中心区的街景，真是一幅奇特的画面。

除夕夜，我们几人仍在楼上的房间里自用年夜饭，虽然房间招待告诉我们楼下正在举行节日晚宴。我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写字，房间的阳台除了可以观看街景外，主要用来活动活动身子。就这样，在悲凉和寂寞中度过了1941年的最后一夜，不过，与当地其他几百万人相比，我们的境况应算是很幸运的。

1942年元旦这一天，天气晴朗但比较寒冷，入夜，圆月当空，因为这天正是阴历十一月十五。没有办法买到新日记本，只好仍用旧的，至于上面的日期，只需往后推一天即可。

元月2日的早报报道说，日军距新加坡不过400英里，而距马尼拉只有70英里了。在南京的日军畑俊六将军在新年演说中，竟然宣称不打垮“重庆政权”，决不罢休。我们现在能读到3份早报（《华侨》、《循环》、《自由》），虽然版面都比过去大大缩减，所载内容也基本相同，但毕竟是我们能获得一些信息的重要渠道。水龙头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n.com

里开始流出自来水了，不久，恢复了正常供水，这使我们感到满意。又过了不久，电灯亮了，酒店里重新变得灯火通明。这时，我们被要求写出个人履历，交给设在楼下的"兴亚院"总部，这个"兴亚院"的总部在半岛酒店也有。所谓"兴亚院"，顾名思义，就是在日本统帅下，重新树立亚洲人的荣耀与权力的一种协会或组织。

大概在元月5日，传来了马尼拉沦陷，以及湖南长沙二次失守的消息。在华盛顿，有26个国家共同签署一项协定，声明决不与敌单独媾和。但是，其中一些国家已经被德国法西斯征服或占领。拉丁美洲国家将于元月中旬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大家都期待这次会议能作出重要决定。

我们中的一位是算命术业余爱好者，为打发无聊的日子，他用生辰八字为我们每人推算了一生的命运，过去和将来，成功与失败。所谓生辰八字，就是用天干地支表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合起来是四对，八个字。我只知道我出生的年、月、日，而不清楚具体时辰。但是，因为他对我过去的经历非常了解，所以为我推断出两个最可能的出生时辰，他认为，只有这两个时辰才能与我的八字中的其他三对相匹配。随后，他又根据我有几个子女，从两个时辰中确定其中一个为我的出生时辰。他不厌其烦地用两种稍有不同的方法为我们算命。我的这位朋友对于我1920年第一次入北京内阁及其以后的经历是很熟悉的，但并不清楚我此前的情况，可他却基本准确地算出来了，真叫我吃惊。他说，我的人生履历始于1901年（这一年，我开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授），官运之星出现在1906年（这一年，我在北京会试中，获第二名，赐进士），从1911年起连续五年升官晋级（这一时期，我由翰林院编修、外交部参议、外交部次长、进而任驻德公使等等），1921年，官运之星达到

最高点(这一年,我出任内阁部长、署理国务总理职务),1926年后有几年不太得意(这里说得也对)。他说我1931年重返外交界,和1936年的退出都是命中注定的。他还说我在1945年会生一场大病,躲过这一劫之后,1946－1951年,将再任重要角色,为公众服务。之后,则气数将至尽头了。预知自己还能有十多年寿命,至少可以亲眼看看眼前世界上发生的这场战争究竟结局如何,不禁喜上心头。我虔诚地祈祷,不要再让自己去驾辕拉套,不要再卷入政治旋涡。

另一位老友富有诗兴,曾为我赋诗两首:[1]

出使归国已数载,
忍看东亚战云霾。
故都雄辩犹在耳,[2]
沪上再逢发尽白。

战时救助君尽瘁,[3]
怎信秋风把君摧。[4]
有心救世挽陆沉,
无力回天心已碎。

为答谢老友的一片盛情,我也作诗两首和之:

花甲之年捧节还,

---

① 此两首诗和下面两首诗均未见到中文原文,系据英文移译。——译者
② 指我和我的朋友同时出席关税会议。
③ 指1938年,我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会长。
④ 指1941－1942年我们在香港的经历。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每思绩少总自惭。
昔日京城旧宾主，[1]
今日皆作要人看。

同文同种唇齿连，
相煎相残青史寒。
无常肆虐万民索，
上天飞临亦嗟叹。

这一时期，物价进一步上涨，食品价格涨得尤其厉害。大米涨到2元钱1磅，甜橙、苹果和雪梨每个7角。一盒“运道牌”香烟，竟要3元6角。港币2元兑换日本军用票1元，而我国法币5元的钞票，只当港币1元使用，因为原港英政府曾在票面上加盖“值港币1元”的印戳。

各家早报，包括著名的《星岛日报》(新加坡的百万富翁胡文虎所拥有)，都登载消息说，三家华人大饭店都已改作集中营，关押英国人、美国人和荷兰人。确实，我从香港酒店阳台上看去，见一个以前认识的美国银行经理，由他的同僚陪伴，在街上走着，大概是从他们的办公室出来去指定的上述某个饭店。

上述那条消息以下的版面是日军所得的战利品和战俘的清单：步枪998支，飞机5架，机关枪1020挺，大炮122门，炮弹18000发，装甲车10辆，汽车1470辆，火车车厢309节，鱼雷驱逐舰2艘，击落飞机14架，击沉炮艇4艘、船舶13艘，生擒战俘11241名，击毙敌兵1555名。

---

① 指我的朋友作为我的房客曾在我的北京寓所住过一段时间。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日本自称此次战役，其陆军阵亡675名，受伤1404名。稍后，日本海军发布战报，击沉敌人炮艇4艘、鱼雷艇7艘、载油艇1艘、扫雷艇2艘和快船8艘。俘获敌人船舶110艘，排除水雷128枚。日军一艘300吨的舰艇因触水雷沉没。

各报还及时报道了两个重要的地方民众团体的成立，其一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组织，其二由当地广东人中的名流发起组织，包括原律政司成员、银行家、商人、律师、医生等等。两个团体都被日本军管当局请去共进午餐，要求他们协助日军恢复香港和九龙的正常秩序。之后，电影院一个个开门放映电影，影片有日本的，也有中国的，开始免费观看，后来低价售票，场场客满。

我担任国内几个教会大学的理事会理事，当我从报上得知北平的教会大学在"市长"关照之下，在关闭一个月之后，将重新开学，不禁想到上海的教会大学，是否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国际新闻方面，报上报道前美国驻北京公使马慕瑞，从莫斯科调任美国新任驻土耳其大使的顾问。日本正在与德国和苏联相商要事，其驻德大使在柏林晋见希特勒，其驻苏大使在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两位副人民委员会面。这是否意味着局势将有新的惊人发展？新闻栏目中还提到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已乘坐潜艇返英，以及传闻艾登先生将接替丘吉尔任英国首相。如果艾登真的出任英国首相，他也许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一条日本医疗用船被敌方一艘潜艇击沉的消息，引起香港报纸的一片愤怒声讨，而美国"莱克辛顿"号航空母舰被日本潜艇击沉又使香港陷入极度恐慌之中。蒋介石将军据报道已自任外交部长。《南华日报》特别关注南京动态，如德、意两国大使抵达南京、呈递"国书"，以及接风酒会等，都有详细报道。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日军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军事进展情况，报上也逐日加以报道，不过，只有新加坡的陷落，才可以说是日军所获的最大胜利。1942年1月11日，日军在荷属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的登陆，确保了日军所需油料的供应，这一切标志着太平洋战争已扩大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实际上，整个南太平洋，除了澳洲外，都已包括在战区之内。交战双方都清楚，战争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因此必须尽可能垄断所有的资源，以及进行外交活动，争取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以保证最终取得胜利。民主国家最初的失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舆论反响极大，也导致了政府的改组，有关消息时有报道。秘鲁和墨西哥看来要与他们的北美邻国采取一致行动了，其他决定随时都可能出台。

在《新报》上刊登了一份有意思的文件，也许是日本白皮书，是关于1941年4月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美日在华盛顿谈判的经过，其中大部分关于两国政府的建议和反建议的内容是第一次公布于众。另有一篇文章论述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12月间，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轨迹。

当我和我的朋友被日军留置在香港酒店加以“保护”的日子里，日本高级官员两次约我谈话，第一次是1月10日，在酒店的客厅里，在座的有日本驻南京派遣军参谋长后宫淳中将、驻香港日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岗田大佐和其他官员。这次谈话实际上就是一问一答，时间也不长。第二次谈话是2月15日，在我的卧室里，来者有汪精卫的日本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河本大作和岗田两大佐。这次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时间也比较长，可以说比较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两次谈话，他们都要求我谈谈对国际时局看法，以及我今后的打算。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in.com

对于太平洋战争，我说，这场危机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如此广阔的地域都卷入了这一战争，情况之复杂，实为有史以来所罕见。由于我一个多月没有读到报纸，只是从传闻多少得到一些信息，我甚至不清楚战争的最新进展，我确实无法谈什么具体的看法。至于重庆宣战问题，我说，我只是间接地听说，没有看到宣战的正式文件，不知道宣战的直接原因，所以很遗憾，我不能作毫无根据的评论。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谈，那就是中日两国的军事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造成了双方的巨大损失，中国的难民多达几千万，财产物资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而现在战火还在蔓延，战争范围还在扩大，想到这些，心情不免悲哀和沉重，鉴于我的年龄，我的近期的活动，只是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世界重获和平。

当日方问我是否打算投入政治活动，我回答说，7年前我就辞去了驻苏大使的职务（因为自己病情严重），早已放弃了继续从政的念头，近年来，只是致力于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过去曾在北京政府中担任政治的和外交的工作，先后20多年，回忆起来，少有建树，深感惭愧。本人年事已高，健康不佳，参与活动，不得不十分谨慎。换句话说，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认为我的态度太消极，或说我对国事漠不关心，那是一种误解。况且，从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来看，我认为教育和解决百姓生计问题，是拯救我国的两项基本手段。没有这两方面的进步，政治稳定难以实现。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在岁暮之年，再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关于促进中日永久和睦友好的问题，我说待我回到国内后，我会将我所看到的提供给政府参考。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外界一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般不知道的事情，在巴黎和会上，中日两国为山东问题相持不下，可是，当日本代表在会上提出种族平等的原则时，中国代表立即全力支持，这就证明很久以前，当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出现时，两国是能团结一致的。

至于我个人的履历和业绩，对于那些关注公共事务的人来说，应是清楚知道的，他们会肯定我在这里的陈述正确无误，以上就是这次谈话的基本内容。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